



JIUQUAN LISHI WENHUA CONGSHU

|酒|泉|历|史|文|化|丛|书|

酒泉商贸史

JIUQUAN SHANGMAOSHI

孙占鳌 刘生平 张宏伟 /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孙占鳌，男，甘肃省酒泉市人。现任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酒泉分院院长、研究员，甘肃省史志学会副会长，酒泉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酒泉市史志学会会长，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主编《酒泉市志》（上、中、下三卷），获甘肃省优秀史志成果一等奖、甘肃省社会科学三等奖、酒泉市社会科学一等奖；主编《酒泉通史》（五卷），获甘肃省优秀史志成果一等奖、甘肃省社会科学二等奖、酒泉市社会科学一等奖；主编《酒泉年鉴》十三卷，其中有七卷获甘肃省优秀史志成果一、二等奖；出版《酒泉历史文化概览》《酒泉人口史》《酒泉民族史》《敦煌文化与敦煌学》《酒泉方言研究》《酒泉华夏文明概论》《酒泉民俗研究》《酒泉文学史》《酒泉艺术史》《酒泉历史文化论稿》《河西简牍综论》、甘肃蓝皮书——《甘肃酒泉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15）、《甘肃酒泉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16）等著作，发表论文数十篇。2010获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JIUQUAN LISHI WENHUA CONGSHU

酒 | 泉 | 历 | 史 | 文 | 化 | 丛 | 书

酒泉商贸史

JIUQUAN SHANGMAOSHI

孙占鳌 刘生平 张宏伟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酒泉商贸史 / 孙占鳌, 刘生平, 张宏伟著. --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226-05087-3

I. ①酒… II. ①孙… ②刘… ③张… III. ①商业史—酒泉 IV. ①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7129号

出版人：王永生
责任编辑：贾文
封面设计：管军伟

酒泉商贸史

孙占鳌 刘生平 张宏伟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酒泉市汇丰彩色印刷广告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3.25 字数371千字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02000

ISBN 978-7-226-05087-3

定价：100.00元



序

酒泉的历史文化是厚重的、丰富多彩的，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史的典型缩影。说它厚重、丰富多彩，不仅在于这里是早期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曾演绎过波澜壮阔的政治史、异彩纷呈的文化史，也在于演绎过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商贸史。说酒泉是“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实至名归。

对于酒泉的政治史、文化史等，以孙占鳌研究员为首的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酒泉分院的各位同仁，在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感召下，克服种种困难，知难而上，相继出版了《酒泉通史》《酒泉历史文化概览》《酒泉人口史》《酒泉民族史》《敦煌文化与敦煌学》《酒泉方言研究》《酒泉华夏文明概论》《酒泉民俗研究》《酒泉文学史》《酒泉艺术史》《河西简牍综论》等系列著作，在学术界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令同行由衷的钦佩。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酒泉商贸史》，是孙占鳌研究团队奉献出的又一道精神大餐。

本书所研究的问题，时间跨度长达四五千年，囊括了从史前四坝文化到新中国各个时段，叙述的下限到20世纪90年代，涉及面甚广，内容相当复杂。但凡贸易物品、贸易通道、商帮、价格、贸易税收、邮驿、货币流通、商贸管理机构、商贸制度、商贸民俗、商贸政策等与商业活动有密切关联度的方面，只要有证据、有史料佐证，都会披沙沥金，如数家珍般一一道出。同时，还在必要的章节内论述了商贸与经济、商贸与金融、商贸与政治、商贸与军事、商贸与外交、



商贸与文化的关系，做到了条分缕析、纲举目张、浑然一体。作者以扎实的史学基础功底、娴熟的史学研究技法保证了著作内容的宽度和深度，既不失浑厚，又细致入微；既全面反映了酒泉商贸发展的历史过程，展示其连续性、继承性、变异性、规律性，剖析每个时期、朝代的特点，又突出应有的重点、解决难点，特别注重对新产生制度及其流变的渊源、内容及影响的阐述，做到了点面结合，条理系统，眉目清晰，凸显了区域商贸史的特殊价值。读完此书，酒泉在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商贸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跃然纸上。正因为如此，这部书就不仅仅是一部资料性丰富的、成功的专著，还是一部学术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优秀著作。对我们更加全面透彻地认识酒泉、了解酒泉，树立酒泉人民的自信心、自豪感大有裨益。

据我所知，七八年前，早在构思并撰写《酒泉通史》的时候，孙占鳌先生就有率领其团队接下来撰写酒泉各门专史的宏愿，并在着意收集方方面面的史料。所以说，《酒泉商贸史》的成书实际上是《酒泉历史文化概览》《酒泉人口史》《酒泉民族史》《敦煌文化与敦煌学》《酒泉方言研究》《酒泉华夏文明概论》《酒泉民俗研究》《酒泉文学史》《酒泉艺术史》等专史的成书是一样的，是多年构思、多年积累并持之以恒的必然之果，绝非短时期内完成的。

本书中吸收了不少前贤和同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但其可贵之处却在于能够融会贯通，不拘泥于已有成说，融进了不少作者独立自得的学术见解，有些章节就是在作者已发表的论文基础上提炼而成，不乏经过深思熟虑的真知灼见。正因为有了这些学术支点，也就使本书具备了较高的学术品位。

相对于政治史、文化史而言，商贸史不大好写。这也是学术界治政治史、文化史者多，治经济史者偏少，而治商贸史者更少的原因。反映在现有成果方面亦然。说到底，历朝历代不重视商贸，将之视



为“末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虽已认识到“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但仍然把商业看作是“末业”；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涉务》中也重申：“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相应地史书中记载商贸的史料也就少。史料少了研究自然就难了。特别是地区性的商贸史，相对而言，史料就更稀缺一些。在这样的背景下，《酒泉商贸史》能取得如此成就，实属不易。作者付出的辛劳和汗水是显而易见的。

时下，全中国人民都在筑梦“一带一路”。这一跨越时空的宏伟构想，从历史深处走来，融通古今、连接中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承载着丝绸之路沿途各国人民发展繁荣的梦想，赋予古老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研究丝绸之路上的商业贸易真真切切是学术界的热点。从此角度讲，孙占鳌研究员为首的研究团队适时推出《酒泉商贸史》这一力作，无疑是恰逢其时。他们学术的敏感性令人钦佩。

在当下学术著作的出版是颇为艰难的。酒泉市的当政者高瞻远瞩，致力于酒泉文化软实力的打造，一以贯之地扶持和支持“酒泉历史文化丛书”的研究与出版，令人感佩至深。

我作为河西人，加上是学历史出身，对河西走廊的历史文化关注自然就多一些。承蒙孙占鳌先生抬爱，其出版的多部著作我都能先睹为快。名曰“审阅”，实则更多的是先一步学习，每每受益良多。

《酒泉商贸史》即将出版，本人不揣浅薄，谈如上感想、感念。忝为序。

尹伟先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

（尹伟先，甘肃省历史学会副会长、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 第一章 先秦时期商品贸易的雏形 /1
 - 第一节 史前时期的商品交换 /1
 - 第二节 玉石之路 /7
 - 第三节 早期的丝绸之路贸易 /10
- 第二章 两汉时期的商业贸易 /15
 - 第一节 汉代丝绸之路的发展 /15
 - 第二节 商品经济的发展 /24
 - 第三节 商业贸易的发展 /34
-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商业贸易 /41
 - 第一节 曹魏西晋时期的酒泉商业贸易 /41
 - 第二节 五凉时期的酒泉商业贸易 /44
 - 第三节 北魏时期的酒泉商业贸易 /53
 - 第四节 北周时期的商业贸易 /57
 - 第五节 粟特人在酒泉的商贸活动 /59
 - 第六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商路 /68
- 第四章 隋代的商业贸易 /76
 - 第一节 商品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76
 - 第二节 隋炀帝西巡对河西商贸的推动 /82
 - 第三节 裴矩在河西地区的招商活动 /87
 - 第四节 隋代的民族贸易 /90
- 第五章 唐宋时期的商业贸易 /94





- 第一节 唐初、中期的商业贸易 /95
- 第二节 吐蕃统治时期的商业贸易 /119
- 第三节 归义军时期的商业贸易 /124
- 第四节 回鹘统治时期的商业贸易 /143
- 第五节 西夏时期的商业贸易 /147
- 第六章 蒙元时期的商业贸易 /156
 - 第一节 蒙元时期的河西商道 /156
 - 第二节 商品经济的发展 /170
 - 第三节 元代贸易格局 /178
 - 第四节 马可·波罗在酒泉 /190
- 第七章 明代的商业贸易 /197
 - 第一节 明王朝对河西地区的经营 /197
 - 第二节 明代酒泉商品经济的发展 /201
 - 第三节 明代的丝绸之路与驿站 /210
 - 第四节 贡赐贸易 /218
 - 第五节 明代肃州商业贸易的发展 /228
- 第八章 清代的商业贸易 /240
 - 第一节 交通的发展 /240
 - 第二节 商品经济的发展 /243
 - 第三节 肃州贸易 /250
 - 第四节 集市贸易 /265
 - 第五节 商业团体 /271
 - 第六节 清中后期肃州商业贸易的回落 /276
- 第九章 民国时期的商业贸易 /285
 - 第一节 民国初期的经济社会状况 /286
 - 第二节 抗战时期交通发展对商业的促进 /298
 - 第三节 民国时期酒泉商品经济的发展 /304
 - 第四节 商业团体与商号 /315
 - 第五节 解放战争时期的经济危机 /323

第六节	民国时期的金融 /328
第十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商业贸易 /331
第一节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商业 /331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商业 /340
第三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商业 /358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商业 /373
第五节	新时期的酒泉商业 /382
参考文献	/402
后 记	/406





酒泉古代商业贸易，是“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地位特殊。先秦时期玉石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开启了早期的“丝绸之路”贸易。西汉张骞通西域以后，“丝绸之路”贸易正式形成。经历了两汉、魏晋时期的发展，隋唐时期“丝绸之路”贸易高度繁荣。这时的酒泉、敦煌发挥了“丝绸之路”贸易中转站和贸易大都会的作用，各国客商云集，市场繁荣，商品丰富。宋元时期，“丝绸之路”贸易格局发生了变化，繁荣程度远不及隋唐时期。明代中期，由于西域蒙古贵族侵扰，明王朝被迫关闭嘉峪关，“丝绸之路”贸易基本中断，只保留了少量的贡使贸易。清代，酒泉再度成为中外商业贸易的中转市场，朝贡贸易和绢马互市引起中外客商的关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酒泉的商业贸易体系不断完善，商品日益丰富，商品经济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第一章 先秦时期商品贸易的雏形

早在新石器时代，酒泉先民在创造了发达的农耕文明的同时，开始了原始的商品交换。

第一节 史前时期的商品交换

酒泉先民在四坝文化时期，就开始了农产品、畜牧产品的原始交换。到了骊马文化时期，人们驯养大型家畜马、骆驼等已经比较普遍，这都为规模化物物交换的长途贩运提供了条件，早期的商贸活动开始孕育。

一、四坝文化时期的物品交换

马家窑文化是河西走廊地区最早的古文化（公元前3100—前2700），但在酒泉地区遗址点分布稀疏，仅在个别地点发现零



星的遗物^[1]。马家窑文化的生产方式以农业为主，同时兼营饲养业^[2]。马家窑以后则体现为由农业向牧业的过渡，马厂文化可为其代表。马厂文化以后发展为以牧业为主，以农业为辅，四坝文化可为其代表^[3]。

四坝文化遗址在酒泉地区内有多处分布。四坝文化生产工具发现较多，系用石、骨、陶等不同材料制成。石质工具有斧、刀、锄、锤、盘状器、磨盘、臼、磨棒、砍砸器、镑、凿、环状器等。石斧分双肩形和亚腰形。石刀多作长方形，穿孔一般为1~2孔，个别有4孔的。磨盘形体较大，呈马鞍形。盘状器和砍砸器数量较多，形式亦多样。骨制工具有锥、针、凿、匕和纺轮等。骨匕磨制较精致，体较薄，一端穿孔。从生产工具的形制和功能考察，四坝文化的农业是有一定基础的。石器中有用于农作的锄和镰，用于加工谷类的臼、磨盘和磨棒，铜器中也有农具镢、镰、刀等。除了常见贮藏粟粒的陶容器外，还发现了小麦、大麦、黑麦、稷和高粱等炭化籽粒，表明当时已种植多种作物。在玉门火烧沟遗址中发现有存放粟米的陶瓮，东灰山遗址中发现有多种作物籽粒，可见种植业很普及。陶器中有些容器如人足形深体罐和小型方杯等，可能属于酒器，酿酒的习俗也反映了农业的发展程度。在火烧沟遗址墓葬中发现有盛在大陶罐中的粟粒和陶制的酒器如彩陶方杯和人足罐等，在一些尸骨、铜器和陶器表面有麻类纺织品的痕迹^[4]；东灰山遗址出土的陶器上

[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413~414页。

[2] 谢端据：《甘青地区史前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71页。

[3] 杨富学、陈亚欣：《河西史前畜牧业的发展与丝绸之路的孕育》，《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4] 何双全：《甘肃先秦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



还发现有麦穗纹饰^[1]。这说明当时的人们不仅广泛种植粟、麦、麻等农作物，而且农业生产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可以提供足够的粮食用于食用和酿酒。这一时期多数遗址有陶窑，葬物中有大量的彩壶、瓮、罐、瓶、碗、盆、钵、孟等陶器，形式多样，造型优美，胎薄面光，说明制陶业已趋于成熟。男性墓葬中多是石刀、石斧，女性墓葬中则多是纺轮，说明当时酒泉境内先民已出现男耕女织的劳动分工。也说明当时由于劳动分工的变化，已有了不同地区的部落或氏族之间的物物交换。

四坝文化的铜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器型种类多，制作精美。迄今为止，在山丹四坝滩、玉门火烧沟、瓜州鹰窝树、民乐东灰山、西灰山、酒泉干骨崖等四坝文化遗址采集和出土的铜器已有 270 多件，大致可分为工具、武器和装饰品几大类^[2]。玉门火烧沟墓地的 106 座墓葬中发现有斧、钺、镰、刀、削、匕首、矛、镞、针、铜泡、耳环、权杖头、镜形器等，瓜州鹰窝树发现四坝文化时期的铜器，包括耳环、镞、锥、泡、刀、削、珠等。火烧沟墓地发现的铜器以红铜为主，开始出现砷铜、锡青铜等合金铜，另外瓜州鹰窝树遗址采集的 7 件铜器均为锡青铜^[3]。这些铜器以小件工具、武器和装饰品为主，制作技术不仅有铸造技术，还有较为复杂的合范铸造。就其种类和形制而言，四坝文化铜器与较早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齐家文化所出同类器物差别不大，但显然更为进步一些。如锥的形制已相当规范，且均为有柄复合工具；铜刀个体较大，以往罕见或不见的环首刀、有銎斧已成为常见之物，代表了一种新的、更为进步的文化因素；

[1] 李瑶等：《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新石器遗址古农业遗存新发现》，《农业考古》1989 年第 1 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甘肃民乐县东灰山遗址发掘纪要》，《考古》1995 年第 12 期。

[2] 刘生平：《酒泉早期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丝绸之路》2015 年 06 期，15 ~ 18 页。

[3]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 年，第 434 页。



就器物的合金成分来看，玉门火烧沟遗址中，红铜器和青铜器的比例大致相当，约各占 50%，个别器物含有少量的砷；民乐东灰山遗址出土的铜器均含有砷，其含砷量在 2% ~ 6%，部分样品锡的含量接近 8%；酒泉干骨崖遗址所出铜器主要是铜锡、铜砷合金。其中铜砷合金的含砷量为 1% ~ 6%，铜锡合金的含锡量多为 2% ~ 10%，与东灰山遗址铜器的砷、锡含量接近；年代稍晚于东灰山和干骨崖遗址的瓜州鹰窝树遗址出土铜器全部为铜锡合金制品。研究表明含砷 2% ~ 6%，是砷铜合金最理想的成分范围，在此范围内合金具有较好的延展性，在冷加工时不会出现裂纹，合金的硬度也会大大提高^[1]。四坝文化的冶铜业比齐家文化的发展程度更高，铜器已广泛存在于生产、生活、军事及装饰领域，青铜制作已经程序化、规模化。

酒泉境内早期青铜器考察表明，酒泉史前冶金术发展较早，且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器类多为小型工具、武器和装饰品，形制上带有明显的北方草原的风格。同时表现为早期冶铜业的转折期，“红铜逐渐向青铜转变，铸造向合金进步，这一地区冶金术的发展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发展起来的^[2]。”火烧沟出土的四羊首青铜权杖头，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复合模具分铸的青铜饰品，而世界上最早的权杖头出现在西亚和埃及地区，可以肯定火烧沟发现的权杖头应该是东西文化互动交流的产物。结合玉门的火烧沟、砂锅梁、瓜州的鹰窝树、兔葫芦等遗址发现的绿松石珠、肉红蚀花石髓珠、琉璃珠、蜻蜓眼式珠等，这些都是外来文化影响的装饰品。同样发现的铜器如代扣、牌饰、铜斧、铜泡等均有斯基泰文化的因素^[3]。”我国西北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都是小件铜工具、兵器和装饰品，与中亚和西亚的铜器从形制和种类都别无二致。有理由认为，冶铜术是通过

[1] 李水成、水涛：《四坝文化铜器研究》，《文物》2000年第3期。

[2] 杨富学、陈亚欣：《河西史前畜牧业的发展与丝绸之路的孕育》，《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6卷第3期，2015年5月。

[3] 杨富学、陈亚欣：《河西史前畜牧业的发展与丝绸之路的孕育》，《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6卷第3期，2015年5月。



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1]。”所有这些都说明当时的物物交换和东西文化交流已经比较普遍了。

四坝文化的这些大量出土物充分说明，随着金属工具、金属冶炼以及纺织、酿酒等生产技术的出现，又进一步促使了农业和手工业分离。促进这一社会分工实现的主要原因，除了生产工具的技术进步以外，最重要的应该说是市场交换的作用。因为，只有当人们通过生产实践和无数次的交换活动，才能使人们逐步意识到社会分工可以取得比原来更高的生产效率，用尽可能少的劳动耗费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从四坝文化遗址考古分析可以看出，当时的酒泉先民早已出现了原始的劳动分工，出现了专门从事种植、放牧、彩陶、铜器、纺织等生产的人群，人们的劳动分工更加精细。这种劳动分工的发展和巩固，必然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样就出现了比较多的剩余劳动产品。偶然出现的剩余物只能有偶然的交换，当剩余物的出现成为经常的现象时，交换活动才有可能由自发的行为转变为有意识的行为，市场交换才能作为社会经济现象最终被巩固下来。

二、史前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酒泉史前物物交换的实证就是出土于境内四坝文化时期的大量海贝与蚌饰品。玉门火烧沟遗址发掘的装饰品丰富多彩，有绿松石珠、玛瑙珠、金银饰品、海贝和铜镯、铜耳环、铜管以及牙饰、蚌饰等。蚌饰是将蚌壳打磨穿孔，牙饰是用兽牙，在其一端穿孔。这些穿孔饰品可用绳连成串，挂在颈项上或胸前。尤其海贝，出土有上百枚，有的墓葬还出土了长串的海贝^[2]。绿松石珠、玛瑙珠、海贝等可能就是由于物物交换而来的。尤其海贝应是由沿海地区交换来的，这些海贝放在死者口中或贮于陶器之内，它是一种较为贵重的物品，

[1] 王巍：《汉代以前的丝绸之路——考古所见欧亚大陆早期文化交流》，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01月12日，第4版。

[2]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三十年》，载《文物考古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42页。



既可作为装饰品，又可能赋予了货币的职能。

酒泉境内四坝文化的其他墓葬中也发现了大量的贝壳类以及用贝壳加工的装饰品。如在酒泉干骨崖墓地发掘海贝 10 枚，其中 M2 出土 5 枚，基本保持海贝的自然形状，背面有的打磨穿孔，长 2.1、宽 1.4 厘米。另有蚌牌 23 件，其中 M26 一件蚌牌呈椭圆形，薄片状，顶端中间钻一小圆孔，制作光滑。还出土少量个体甚小的蚌饰、蚌珠及海贝^[1]。在瓜州鹰窝树遗址 M1 中出土 2 件蚌饰，均系天然蚌壳制成，中心位置有穿孔，另外发现海贝 1 件，背部也有穿孔，长 2.3、宽 1.85 厘米，同样在 M3 也发现海贝 3 枚；并采集到蚌饰 7 件，在瓜州兔葫芦遗址采集到海贝 5 件^[2]。海贝、蚌饰等饰品在河西走廊其他四坝文化的墓葬中还有大量发现，如民乐东灰山遗址发现海贝 4 件、蚌饰 15 件^[3]，永昌西岗墓 80 件、柴湾岗墓地 23 件等^[4]，这些海贝均非内陆所产，应该来自东部沿海地区，依据已有的研究表明东灰山遗址发现的海贝来自辽宁、台湾、广东、海南、西山群岛等地，海贝大多有穿孔，用来佩戴，或者是死者口含和手握，说明人们对它们的珍视和在社会中的重要性^[5]。这些来自东部沿海的文化遗物，目前还未有其他的证据说明文化之间的交流，应该是跨距离贸易的结果。

酒泉处于河西走廊的西段，为“丝绸之路”的要道，也是东西

[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酒泉干骨崖墓地的发掘与收获》，《考古学报》2012 年第 3 期。

[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 年，第 355 ~ 356 页、359 页、395 页。

[3]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墓地的揭示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41 页。

[4]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西岗柴湾岗：沙井文化墓葬发掘报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09、182 页。

[5]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民乐东灰山：四坝文化的揭示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 年。



方文化交流的必经之路。早在史前时期，酒泉先民与周边以至更大范围的物物交换和文化交流就已经开始了。有学者认为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实例有黍、彩陶、小麦、冶金术、玉石、家马和马车、欧亚草原风格青铜器和动物纹饰、玻璃器、丝绸等^[1]，而河西走廊发现的最早的民乐东灰山遗址距今 4500 年左右的麦类作物，酒泉境内早期的大量青铜器，火烧沟遗址发现的距今 3700 年的骆驼骨骼，所有这些都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物证。从火烧沟遗址中的出土文物看，当时的社会分工已达到相当规模。遗址出土的金耳环、玉、绿松石等非本地产品，须经交换和贸易而来，遗址中出土的天然贝、骨贝和石贝，表明火烧沟的价值形式已由一般价值形式进入货币价值形式，货币正式进入酒泉地区经济生活中。货币形态的形成，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但货币形态一旦出现，它将极大地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二节 玉石之路

中西方文化交流在丝绸还未成为主要贸易商品之前的远古时期就已存在。这条贸易通道就是“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只有 1600 多年的历史，而“玉石之路”却有着 6000 多年的历史。在 6000 多年的岁月中，和阗玉传遍中国各地，流传到中亚、欧洲乃至全世界，使和阗玉登上了古代文明史、现代和当代文明史，称誉世界。玉石作为大自然孕育的一种特殊物质，一旦被古代先民寄托某种期待和理想，就不再是单纯的物质，它被赋予了品格、神性和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古代先民经年累月，在大漠、山冈、沟壑、河流、戈壁、草原等地方探测开拓，勾勒描绘，终于形成一条相对

[1] 王巍：《汉代以前的丝绸之路——考古所见欧亚大陆早期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 年 1 月 12 日第 4 版。